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过程、动因及影响

The Qianlong Emperor's Criticism of Qian Qianyi: The Proceeding, Motive, and Impact

张小李

Zhang Xiaoli

内容提要：

思想文化专制作为专制统治的一部分，在乾隆时期发展到了极致，其方式主要有文字狱与禁书运动，并辅之以从道德角度评价明季历史人物。钱谦益在明末清初文坛的执牛耳地位、贰臣身份及创作反清诗文的行为，使批判钱谦益成为乾隆帝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重要节点。批判的主要方式为禁书与道德评价。批判钱谦益是清帝加强文化专制的逻辑延伸，有利于清除明季遗民影响，树立本朝文学传统，并强化清人忠君观念。乾隆帝批判钱谦益，并未使其形象彻底负面化，钱谦益影响始终不绝。乾隆帝所推行的以批判钱谦益等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高压政策，遏制了士人的反清思想，同时也对士人心理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关键词：

乾隆帝　钱谦益　文字狱　禁书运动

ABSTRACT

Cultural control, which is part of dictatorial rule, reached it's apogee in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It was enforced mainly by two measures: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the "book purging" effort, as well as moral judgment of the precedi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figures as a supplement. Qian Qianyi (1582-1664), whose leadership in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his role as an official who served both the Ming and the Qing court, and his anti-Qing writings, made him the target of cultural control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Qianlong Emperor suppressed him primarily by destroying his publications and judging his morality. Criticizing Qian Qianyi was a logic extension for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emperor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ensorship, which helped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from leftover subjects of the Ming dynasty, to establish their ow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people's awareness of loyalty to the Manchu Qing empire's rule. The Qianlong Emperor, however, did not completely destroy Qian's image. Qian's influence never waned. The Qianlong Emperor's high-handed cultural policy that targeted Qian Qianyi and others suppressed anti-Qing sentiment, but hurt intellectuals in ways that were impossible to avoid.

KEY WORDS

The Qianlong emperor, Qian Qianyi, Literary Inquisition, book purging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既有士林领袖、文坛盟主的声誉，也有不忠于胜朝而出仕兴朝的“贰臣”身份。因其在诗文中表达了对清朝的不满，钱谦益去世近百年后，乾隆帝对其进行了猛烈批判。乾隆帝对钱谦益之批判，是清帝加强文化专制的逻辑延伸，是登峰造极的禁书运动与文字狱的一部分，也是从道德角度评价明季历史人物（包括死节之士与投清贰臣）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清除明季遗民影响，将明季文学与清代文学进行切割，并强化清人忠君观念。

一　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过程

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谕旨共有 19 道，其中 6 道谕旨专门针对钱谦益，13 道谕旨提及钱谦益。（见图表）

乾隆帝专门针对或提及钱谦益的谕旨

年份	日期	内容述评	点评	指向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十一月庚子日（初六）	批评沈德潜将钱谦益列为《国朝诗别裁集》卷首之冠。	开始批判钱谦益	提及钱谦益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六月丙辰（初六）	毁禁《初学集》、《有学集》，没收书板。	开始查禁钱谦益著作	专门针对钱谦益
	六月乙亥（二十五日）	收缴《初学集》、《有学集》原书板及翻刻板。	收缴书板	专门针对钱谦益
	八月戊寅（二十九日）	查禁广东《初学集》、《有学集》翻刻书板，查钱陈群、沈德潜是否收藏了钱谦益之书。	查翻刻板	专门针对钱谦益
	十二月壬子（初四）	保留汲古阁刻十三经、十七史、《唐诗鼓吹》钱谦益序文之“语无悖谬者”。	保留钱谦益部分序文	专门针对钱谦益
	十二月甲寅（初六）	保留续藏经内钱谦益《塔铭跋》二种。	保留钱谦益佛教著作	专门针对钱谦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二月甲戌（十五日）	毁钱谦益著《楞严蒙钞》。	毁禁钱谦益佛教著作	提及钱谦益
乾隆四十年（1775年）	十一月癸未（十日）	发布《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将钱谦益等作为反例。		提及钱谦益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十一月甲申（十六日）	修《四库全书》，要求将钱谦益等人之书“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	继续毁禁钱谦益著作	提及钱谦益
	十二月戊戌朔（初一）	因《国朝诗别裁集》将钱谦益居首，彻底销毁其原板。	推崇钱谦益是乾隆帝毁禁《国朝诗别裁集》原板的重要原因	提及钱谦益
	十二月庚子（初三）	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将钱谦益等收入其中。	为钱谦益作历史评判	提及钱谦益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二月乙卯（十八日）	将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贰臣分差等，钱谦益居末流。	为钱谦益作历史评判	提及钱谦益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正月甲寅（二十九日）	陶煊、张灿选刻《国朝诗的》将钱谦益等诗选入是在查禁之前，不牵连其子孙。	乾隆帝反对文字狱扩大化	提及钱谦益
	十一月甲辰（十八日）	严禁各省郡邑志书名胜古迹部分编入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人诗文，以及人物、艺文门内载其生平事实及所著书目。	严禁地方以曲线方式保存钱谦益等人著作	专门针对钱谦益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十月癸酉（初四）	将钱谦益等列入《贰臣传》乙编。	为钱谦益作历史评判	提及钱谦益
	十月甲申（十五日）	批评杨维桢《正统辨》颂美新朝，非刺故国，不及钱谦益托言不忘故君。	杨维桢比钱谦益更差	提及钱谦益
乾隆五十年（1785年）	七月庚午（二十三日）	批评钱谦益、吕留良等本人及子孙出仕本朝，但又对本朝不满。	乾隆帝文字狱标准	提及钱谦益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六月戊申（十二日）	《四库全书》中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	力图将钱谦益著作彻底清除	提及钱谦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六月庚申（初六）	《贰臣传》中冯铨、龚鼎孳、薛所蕴、钱谦益等不立传，仅立表。	避免因编纂《贰臣传》而扩大钱谦益等人的影响	提及钱谦益

从上表可以看出，乾隆帝批评钱谦益有显著的特点：第一，时间跨度大，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批评沈德潜将钱谦益列为《国朝诗别裁集》卷首之冠到乾隆五十四年要求在《贰臣传》中不为钱谦益等立传，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时间跨度长达 29 年。这一段时间也是乾隆帝发动文字狱、推行禁书运动的高峰期。第二，乾隆三十四年是乾隆帝对钱谦益的集中批判处置的一年，这一年发布了专门针对钱谦益的谕旨五道，要求查禁钱谦益著作及书板、翻刻板等。第三，乾隆帝对钱谦益的批判处置是全方位的，包括贬损其人格，禁毁其书，并对其做否定性的历史定位。详见下文。

（一）贬损钱谦益人格 ：有才无行

乾隆二十六年，致仕侍郎沈德潜借进京为孝圣皇太后祝寿之机向乾隆帝进呈《国朝诗别裁集》，并请乾隆帝作序。因该书将钱谦益置于卷首，激怒了乾隆帝，这年十一月庚子（初六），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乾隆帝批评钱谦益：

> 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1]

在乾隆帝看来，钱谦益身事两朝，人品不好，不能位居清代诗人之首。16 年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戊戌（初一）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乾隆帝提及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之事，再次批评沈德潜将钱谦益置于首位：“集内将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之钱谦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论。”[2] “有才无行”是乾隆帝对钱谦益人格评价之定论：不否定钱谦益之才，但否定钱谦益之德。

在对钱谦益人格的系列批判中，乾隆帝对钱谦益道德上“无行”的否定达到了极致，即认为钱谦益不算人，如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乙亥（二十五日），乾隆帝下谕旨：

> 钱谦益以故明大员，设使死节，则为明之忠臣。即贬斥本朝，亦所应当，乃既投顺本朝，仕跻卿列，仍以狂悖诋毁之词刻入《初学》、《有学》二集，其人本不足齿于人类。此等诗集流传，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3]

乾隆帝认为，钱谦益如果为明朝死节才有资格诋毁本朝，他投顺、出仕本朝后，仍然保留诋毁本朝之词，所以“其人本不足齿于人类”。乾隆帝多次表述过钱谦益不属人类之意，如钱谦益“滓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4]、“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5]、“进退无据，非复人类”[6]、“同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八，《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九），第 251 页，中华书局，1986 年。下同。
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十三），第 693 页。
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七，《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79 页。
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55 页。
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三），第 593、594 页。
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五），第 294 页。

狗彘之徒”。[1] 痛斥批判对象不属人类，是清代文字狱大批判惯用语言。

（二）毁禁钱谦益著作

乾隆帝因《国朝诗别裁集》批判钱谦益时，尚未认真阅读钱谦益《有学集》、《初学集》[2]，所以当时没有要求查禁钱谦益著作。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乾隆帝连发四道谕旨毁禁钱谦益著作，其原因就是乾隆帝详细阅读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发现其间有诋谤清朝的语句：“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乾隆帝认为钱谦益将其反清作品收入《初学集》、《有学集》，不过是掩饰其投清劣迹，因此时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无法追究惩治，乾隆帝只能毁禁其书：“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乾隆帝还下令搜缴钱谦益书板，以斩草除根，“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以便维护世道人心。其时为六月丙辰（初六）[3]。

六月乙亥（二十五日），乾隆帝称其偶阅查缴送京销毁的钱谦益书的面页，“所刻《初学集》则有本府藏板字样，《有学集》则有金匮山房订正及金阊书林敬白字样。”乾隆要求两江总督高晋将二书原板及翻刻板一并查缴送京。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还要求防止因查禁《初学集》、《有学集》而使其为众人希冀的奇书[4]。

八月戊寅（二十九日），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乾隆帝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广东翻刻钱谦益书板。乾隆帝还重点关注沈德潜、钱陈群二人是否藏匿了钱谦益文集，因二人善于作诗，收藏各家的诗集必多。但乾隆帝又排除了钱陈群，因钱陈群并不特别推崇钱谦益诗文，而且钱久值内廷，必然清楚乾隆帝对钱谦益诗文的批判态度。但沈德潜有褒奖钱谦益的“历史问题”，因推崇钱谦益之诗，必珍惜钱谦益之书，所以乾隆帝重点关注沈德潜，并威胁，若沈德潜家还藏有钱谦益文集，“岂沈德潜不知恩重，不复望朕为之庆百岁耶。”[5] 这道谕旨下达九天之后，沈德潜就撒手人寰了。

《初学集》、《有学集》被禁毁后，一些散见于其他书籍的钱谦益文章陆续发现。乾隆帝对钱谦益的部分文章还是主张保留的。十二月壬子（初四），军机大臣等奏汲古阁刻十三经、十七史、《唐诗鼓吹》、吴伟业《梅村集》、王士禛《渔洋集》等书均有钱谦益序文，请求将这些文章删去。乾隆帝指示，经史及诸集内所有钱谦益序文，“语无悖谬者，俱不必彻毁。”[6] 十二月甲寅（初六），军机大臣等奏续藏经内有钱谦益《塔铭跋》二种，拟请删去。乾隆帝认为，钱谦益《塔铭跋》“所言皆释家之事，语意俱无关碍，亦不必撤去。”[7] 但是第二年，他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乾隆帝御制《观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8] 云：

---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四），第 51 页。

2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六月丙辰（初六），乾隆帝称其九年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虽批判钱谦益，但“彼时未经见其全集”（《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55 页。）但乾隆三十年曾写过《反谦益〈淮阴侯庙〉诗即用其韵》（《清高宗御制诗》卷四十六，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八册，第 40、41 页，《故宫珍本丛刊》第 557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下同。）可见乾隆帝零星读过谦益作品。

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55 页。

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七，《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79 页。

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339 页。

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八，《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353 页。

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八，《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358 页。

8 《清高宗御制诗》卷八十七，《清高宗御制诗》第九册，第 252 页，《故宫珍本丛刊》第 558 册。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自注]。

自注：禅宗以不解真空妙有者，为孟八郎。

在这首诗中，乾隆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节义攻击钱谦益人格上缺陷，并批评钱谦益佛教著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二月甲寅（十五日），乾隆帝在指示处理汉、蒙、清文佛经时，要求“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请毁彻，所有经板书篇，均经一体芟汰，期于澄阐宗门。”[1] 在乾隆帝看来，钱谦益人品不好，其佛教著作对宗门也是玷污。

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钱谦益著作已经禁毁殆尽，编纂时未见乾隆帝对毁禁钱谦益著作发出指令，但《四库全书》修订好，却发现了没有删削的钱谦益著作。乾隆五十二年下令校阅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和珅等阅看后上奏，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乾隆帝下令纪昀等将这些内容删改[2]。

乾隆帝虽要求全面、彻底毁禁钱谦益著作，但部分宫廷藏品上有钱谦益题跋，藏品著录不能不提及钱谦益。如收录清宫佛道书画目录的《秘殿珠林》载，“又钱谦益书《大悲心陀罗尼经》秘本，后云：右经为宋人写本，题云大唐三藏不空译较，今藏函伽梵达摩……佛弟子蒙叟钱谦益盘谈谨书。”[3] 该条将钱谦益题词全文抄录并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

处理钱谦益文集是乾隆帝处理明季诸人书集及禁书运动的一部分。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遇到了一个极为敏感问题，即如何处理明季诸人书集。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十六日），乾隆帝指示对明季文集甄别对待[4]，对钱谦益、金堡、屈大均这些“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诸人之书“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但不可因钱谦益、屈大均辈“一二匪人，致累及众”，如对刘宗周、黄道周这些能死节，“不愧一代完人”之人的书籍，“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因这些书籍对清王朝有利用价值，如黄道周《博物典汇》一书，详细记载了清先祖事迹，“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设谋甚害，具载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实大有造于明人。”

在其后处理明末文人“违碍语”的过程中，下面操办大臣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步军统领衙门奏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理志书时，将“不应入传”的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编入志书，并举告刘遇奇所作《慎余堂集》、《清风亭集》钞本中，有“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等狂谬语句以及乾隆帝名讳。为此，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庚午（二十三日）指出，“清风明月”本来就是常用语言，而刘遇奇本为顺治年间进士，多年前就死亡，怎能想到要避以后乾隆帝之名讳？此论尚属公允。继而乾隆帝提出了惩办的标准：

外间所著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朊仕，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二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二），第 457 页。

2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七），第 183、184 页。

3 《秘殿珠林》卷四，故宫博物院编《秘殿珠林及续编三编》第二册，第 435、436 页，《故宫珍本丛刊》第 435 册。

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三），第 683、684 页。

查严办。[1]

若本人及子孙享受本朝俸禄，但又在诗文中诋毁本朝，如钱谦益与吕留良那样的人就要严办，这其实也是雍正帝、乾隆帝对明季文人发动文字狱的标准。

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所撰诗文，虽久经饬禁，但民间仍然用曲线方式保存斯文。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一月甲辰（十八日），针对“今各省郡邑志书，往往于名胜古迹，编入伊等（钱谦益、屈大均、金堡）诗文，而人物、艺文门内，并载其生平事实及所著书目”的情况，乾隆帝要求各督抚将省志及府县志书，悉心查核删除[2]。

（三）对钱谦益做否定性历史定位

除毁禁著作之外，乾隆帝借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之机，还从道德评价上、历史定位上彻底否定钱谦益。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初十），在《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3]中，乾隆帝赞扬“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的史可法等人，严厉批判钱谦益“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后又“假语言文字，以图自饰其偷生。”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初三），乾隆帝下令编纂明季《贰臣传》[4]，将钱谦益等众贰臣编入。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二十四日），乾隆帝要求将《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5]，指出钱谦益等在明朝灭亡时率先投降，但又在诗文中诋毁本朝，与洪承畴、李永芳等贰臣不能相提并论。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初四），乾隆帝明确要求将钱谦益列入《贰臣传》乙编，“以昭褒贬之公”[6]。但乾隆帝觉得将钱谦益等人列入贰臣传的惩戒力度还不够。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庚申（初六），乾隆帝在谕旨中认为钱谦益等“劣迹斑斑”，在《贰臣传》中不立传，只立表，排列姓名，摘叙事迹，“俾天下万世，共知似此行同狗彘之徒，既不得炳丹青之列，仍不能逃斧钺之诛”[7]。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对钱谦益的批判是有边界的。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因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第一次批评钱谦益时所谓“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8]虽是就诗歌而言，但也是批判钱谦益的边界，即猛烈攻击其投降行径及入清后的言行，而不溯及钱谦益在明廷的举止，《明史》中关于钱谦益的内容可以佐证。《明史》编纂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乾隆五十四年《明史》全书勘定完成，编入《四库全书》，这一年乾隆帝最后一次批判钱谦益。可以说，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过程也是组织人员修订《明史》的过程，但乾隆帝并没有因为钱谦益入清后的种种“不堪”而修订《明史》中的钱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三十五，《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六），第596、597页。
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九十五，《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四），第698页。
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三），第316、317页。
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三），第593、594页。
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四），第50、51页。
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五），第294页。
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三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七），第1032页。
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八，《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九），第251页。

谦益形象，钱谦益在《明史》中基本上是正面而健康的。如钱谦益在明朝一大挫折是牵涉天启二年（1622 年）辛酉浙江科场案。《明史・选举二》客观叙述了明朝的种种科场案以及钱谦益牵涉的辛酉浙江科场案，叙述了此事让钱谦益“赦还”以及在崇祯二年（1629 年）会推阁臣时被温体仁等作为攻击钱谦益的理由，最后评论道：

> 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它小小得失，无足道也。[1]

这段评论将科场案分为舞弊、莫须有和小过失三种情况，并没有将钱谦益等科场案坐实。而在其他地方，则对钱谦益科场案抱同情态度，如《明史・乔允升传》直述钱谦益科场案为陷害[2]，《明史・文苑一》也充分肯定了钱谦益在晚明文学上的成就和地位：“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3]

二　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原因探讨[4]

清代统治建立、巩固的过程，就是清帝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学术、历史诸方面确立掌控权、话语权的过程。顺治、康熙朝重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控制，建立中央政权，逐步控制全国各地，编纂了一系列经学书如《御纂周易折中》等确认和强化儒家传统思想的地位，这也是清朝构建统治框架的过程。到雍正、乾隆朝，皇帝全面加强对文化和历史的掌控权、裁判权。乾隆帝对钱谦益之批判，是乾隆帝处理明季士人遗产的枢纽，是清帝加强文化专制的逻辑延伸，其目的是清除明季遗民影响，确立本朝文学传统、强化清人的忠君观念，其中，强化清人忠君观念是主要目的。

（一）批判钱谦益是清帝加强文化专制的逻辑延伸

加强君主专制是自皇太极之后的顺、康、雍、乾诸帝的一贯策略[5]。思想文化专制是君主政治专制的一部分。清代通过文字狱极其派生的禁书运动整肃士人，用高压、恐怖手段不断强化对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同时，清代文字狱也是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力，削弱打击朋党势力与政敌的重要手段。如雍正朝前期文字狱，主

1 《明史・选举二》，第 1705 页，中华书局，1974 年。下同。

2 《明史・乔允升传》，第 6553 ～ 6555 页。

3 《明史・文苑一》，第 1705 页。

4 按：乾隆帝为何要严厉批判钱谦益，据传与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有关。太后下嫁之事，在笔墨中言之凿凿的只有明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中的“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清朝灭亡后，有人附会张煌言诗中的春官（礼部尚书）为谦益，相传谦益还撰写了太后大婚诏文。孟森先生考证，谦益没有出任过清朝的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已经离开了京城还乡。孟森：《清史讲义》，第 136 页，中华书局，2006 年，下同。所以，将张煌言所谓春官附会为谦益，进而将此作为乾隆帝厌恶谦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5 按：努尔哈赤在去世前的政治遗言中要求八旗八王（贝勒）共治，实行类似于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八固山王中推选，并可更换，“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优德者立之”。（《武皇帝实录》“壬戌，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记载。转引自孟森：《清史讲义》，第 36 页。）但皇太极被立为八王首领后，逐步加强君主专制。皇太极继位之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坐而治，天聪六年元旦，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座，代善、莽古尔泰旁侍，彻底破坏了努尔哈赤所定的八王共治格局。但即使这样，八旗内部，旗主与旗属还是君臣关系。顺治、康熙年间，八旗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雍正帝继位后，彻底废除了八旗内部旗主与旗属成员的君臣关系，在满洲内部，极大地强化了君主专制。

要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副产品。雍正帝为打击年羹尧朋党势力，于雍正三年（1725 年）发动了汪景祺之狱与名教罪人钱名世案。文字狱还是皇室内部斗争手段[1]。而曾静、吕留良案，既有严防华夷之辨，为维护清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目的，同时，也是雍正帝打击争夺储位的政敌胤禩、胤禟等残余势力的手段。

但清代文字狱的最主要目的是打击汉族中的排满意识，强化君主专制，加强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控制。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族知识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和民族意识存有深深的戒心；深忌明末遗臣怀念前朝，竭力禁绝明季杂史，尤忌有关南明文献资料；非常忌讳汉族士大夫阶层文集中“胡”、“狄”等有关种族之词。为此，用文字狱的方式铲除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摧毁其的民族气节。清朝第一件文字狱是顺治四年（1647 年）僧人函可《变记》案，函可因撰写记录抗清志士事迹的《变记》而被流放关外。清初顺治、康熙朝的文网还不算严酷，其原因是，顺治朝的首要任务是军事镇压，文字之罪尚无暇细究。康熙帝亲政后，为了笼络汉族名士与其合作，调整政策，宽文网之禁。从雍正六年的曾静、吕留良案开始，文字狱成了清统治者肃清汉族民族意识最血腥的工具，到乾隆朝发展到极致。乾隆继位之初，政局宽缓，但从乾隆十六年（1751 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开始，乾隆帝全面加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发动了大量的文字狱以及规模庞大的禁书运动，一时告讦蜂起，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黄裳先生将文字狱分为两类：“一是因文字开罪了统治者，也就是所谓大逆不道案，在所有狱案中，要占最大多数。其次是以思想罪杀人，这一部分比重较小而意义甚大。”[2] 清代以思想罪杀人，其重要的特点是事隔多年后的追加行为。清初明遗民尚多，其诗文集中难免有不平之气，而清初文网尚宽，这些遗民并未因言获罪，而到了雍正、乾隆朝严文网之禁后，对顺治、康熙两朝的讪诽之言进行追加处罚，如雍正帝处理曾静、吕留良案时，将已经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去世的吕留良碎尸悬首，其子孙被株连。对清兵南下时为僧，后于康熙三十五年去世的屈大均，声称其文“狗彘居心”，将其戳尸枭示，子孙亲属流放福建。

在这种背景下，时时在诗文中流露反清复明意识的明遗民自然难逃被清算的命运。钱谦益晚年所作之《投笔集》中，多以隐晦曲折的借古喻今方式表述了对故明之怀念，对清朝之不满。如《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中，“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3]、“沟填羯肉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4]，其中之“胡”当指清，反清思想跃然纸上；“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5] 表现了国家灭亡之悲、故国之思；“戈船十万指吴头，太白茫茫八月秋”[6] 表现了对海上复明力量的期许。一题诗歌就已经处处犯忌，遑论其他！因此，乾隆帝批判钱谦益，毁禁钱谦益书籍、书板，是清代的文字狱、禁书运动的一部分，是清代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逻辑延伸。

（二）确立本朝文学传统

乾隆帝批判钱谦益也是为了确立本朝文学传统的需要，这也是清代文化专制的重要内容。新朝确立本朝

1 按：清皇室内部的情况，孟森先生指出，雍正帝继位之初惩治了诚亲王允祉幕宾陈梦雷、杨文言，因为雍正帝视他们所编之“《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孟森：《清史讲义》，第 293 页。

2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黄裳《黄裳先生的两封信》（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3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七），第 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下同。

4 《钱牧斋全集》（七），第 2 页。

5 《钱牧斋全集》（七），第 3 页。

6 《钱牧斋全集》（七），第 3 页。

的文学传统，是从思想文化上巩固本朝文化的一部分。如明代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锐意文学，主张简质，这源于他对元代末年文风的不满，也是他试图建立本王朝文学的努力的一部分，如在日常行政中惩罚茹常素疏奏冗蔓，使用行政命令改变行文格式，又通过褒扬文风简质的作家来助长这种风格[1]。当然，朱元璋的文学主张，实为其文化专制的一部分。

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入关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批评《国朝诗别裁集》，清朝统治已建立近 120 年了，已到了认识清代文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时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理清明末文学与清初文学的关系，确立清代文学自身的传统，而沈德潜编纂《国朝诗别裁集》将钱谦益编入卷首之冠，从文学发展角度，无疑抬高了明末文学的地位，降低了清初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乾隆帝因认为钱谦益人品不好，要求将钱谦益“还之明末”，即归为明季文学的范畴，将其与清代文学切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帝将明末文学与清初文学切割的目的。乾隆帝选择钱谦益为突破口，是经过精心地考量的。因钱谦益为文坛宗主，影响大，黄宗羲曾赞钱谦益“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几于弇州相上下”[2]，钱谦益对清代文学的影响至深，其诗歌思想左右了清初顺治一朝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势，即“对明代诗歌思想进行猛烈批判抨击开始，发展而至易代之后从顺治中叶开始，又悄悄地重倡格调，主张在诗歌创作中正本清源，别裁伪体，言志有物，以图挽回大雅”[3]。否定了钱谦益，清初文学的独立性便名正言顺了。而钱谦益以士林领袖的身份投降并出仕清朝，的确是一个软肋，为乾隆帝提供了批判的理由。

乾隆帝反对钱谦益作为本朝诗人之首，并非反对钱谦益的文学观念。入清后，世运、性情、灵心、学问是钱谦益文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钱谦益将这些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个了自己晚年的文学思想体系[4]。乾隆帝在对钱谦益的批判中，并未指出钱谦益哪些诗文主张不对，而只是反对其将反清的“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即用政治标准来干预文学，并不是用文学标准干预文学。乾隆帝本人虽然创作了四万首诗歌，并将宫廷诗歌的创作典制化，但归根到底将诗文创作视为小道，其《御制初集诗小序》有言，“向叙《乐善堂集》云，‘夙昔典学所心得，不忍弃置。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5]，表明其在诗文创作上并没有刻意地追求，乾隆十六年（1751 年）御制《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用苏轼韵》云“余杭此去读奇作，缀辞拙速吾犹堪”[6]，言其诗文创作“拙速”，即笨拙而快，不事雕琢。总之，乾隆帝刻意地表明其关注重点是朝政大事，而不是诗文创作。乾隆帝对钱谦益的批判，不是反对钱谦益的文学主张，而是反对将钱谦益置于开国诗人之首，用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肃清前朝的影响，破旧立新，以便确立本朝文学传统。

除将钱谦益列为第一卷之首之外，乾隆帝在《国朝诗别裁集》还找到了一系列毛病，如直书慎郡王之名，选入雍正年间获罪名教的钱名世，选入与乾隆帝名字同音的诗人等，因此乾隆帝命内廷翰林对《国朝诗别裁集》逐一检删，“为之别白正定矣”[7]。所谓“别白正定”，既是用皇帝的意旨，从重视本朝文学的角度，重新梳

1 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2006 年。
2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 374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
3 黄河：《王士禛与清初诗歌思想》，第 28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4 丁功谊：《谦益文学思想研究》，第 196 ～ 25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5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550 册，《清高宗御制诗》第一册，第 1 页。
6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552 册，《清高宗御制诗》第三册，第 324 页。
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八，《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九），第 251 页。

理清代文学传统，也是确认了皇帝的文化话语权的过程。

（三）强化清人忠君观念

清朝统治的建立和稳固，离不开大量明末投降臣子的合作和帮助，他们虽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未为明朝死节，在忠君的语境下，贰臣以及任用贰臣的新朝都面临道德压力。乾隆帝之前，对明末降臣采取的是功利化的态度，即任用他们，但不对他们做道德定位；到了乾隆帝时，对明季投诚臣子进行道德评价条件成熟了。因为，其一，乾隆帝本人的文治抱负，有对历史进行总结和评价的需求;其二，清入关已将近百年，统治根基已经巩固。而对贰臣进行道德批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抹去本朝任用前朝贰臣的道德责任；其三，乾隆朝的臣子均是入清之后降生，与前明没有历史包袱，批评贰臣对他们没有影响；其四，清统治者是异族入关，树立臣民对清王朝忠诚感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要强化本朝臣子的忠君观念，就绕不开对明季投诚臣子的道德评价。

乾隆帝时明末贰臣已全部过世。对他们的道德评价是以历史评价的方式实现的。以对前明是否忠诚来划线，明季士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死节之士，包括崇祯朝死节之士，以及南明福王、唐王、桂王等政权的死节之士，乾隆帝将其编入《胜朝殉节诸臣录》。一部分是投诚贰臣，而他们又可以分为为清立下功劳之人，与没有立下功劳、甚至起负作用之人，乾隆帝下令一体编入明季《贰臣传》。一部分是隐遁之士，所有未仕遗民皆是，这一部分不在评价之列。

评价明季历史人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在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十八日）《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中，乾隆帝谓："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1] 评价前明历史，要符合春秋精神，即秉持公正立场，以事实和传统道德为依据进行褒贬。

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褒奖明末的死节之臣，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因农民军而殉节，其余的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清人之手，今天表彰他们，当初为何杀死或逼死他们？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十日），乾隆帝发布《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2]，为当初杀掉抗清不屈之明朝死节之臣解套：

> 尔时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顺逆。而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

之所以要杀掉明代抵抗将士，是因为要"申法令以明顺逆"，而事后看来，他们节操坚定，经得起考验。最后，将他们死亡的原因推到明朝皇帝身上，从万历到崇祯，明政不纲，权奸接踵，阉竖横行，以至于黑白混淆，忠良泯灭。次年二月，《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编纂完成并交武英殿刊刻颁行。[3]

有褒即有贬，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是编纂《贰臣传》的先声。乾隆帝以往批评钱谦益等人是因为他们既不能为明朝死节，又对本朝心怀不满，但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初三）所发布的《命国史馆编列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四），第 51 页。

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三），第 316、317 页。

3 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十二《奖忠盛典》。参见《蕉轩随录续录》，第 483、484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明季贰臣传〉》[1] 中，乾隆帝评朱东观选辑《明末诸臣奏疏》一卷，其标准严重倒退，他说：

> 当时具疏诸臣内，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

王永吉等人仅仅投降本朝，乾隆帝就认为其人不足齿。既然认为贰臣不足齿，清为何要任用他们？乾隆帝列举了洪承畴、祖大寿等将帅投降以及清朝建立之初冯铨、王铎等阁臣投降的情况，然后为清朝录用解套：

> 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

不得不录用投降者，是因为要“靖人心而明顺逆”，完全是从功利目的出发的[2]。而现在天下太平了，则道德标准、“风骨”就要登上台面了。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十八日），在《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3] 中，乾隆帝又认为，洪承畴、李永芳、钱谦益、龚鼎孳等虽对明朝不忠，但他们“未尝无有用之才”，是明帝陷他们于不义：

> 故有善守之主，必无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崇祯临终之言，不亦舛乎？

乾隆帝此论有两个目的，第一，继续为清代使用明之降臣解套，因为这些贰臣本身是有才干的，他们之所以成为贰臣，是因为没有遇到善守之主。第二，乾隆帝在此隐含了对后世皇帝的期许和警示，告诫后代皇帝切不可因自身之失误而陷清大臣于死节或成为贰臣的两难选择。

乾隆帝在正面表彰明末死节之士以及在反面批判明季贰臣的一系列谕旨中，钱谦益都是一个批判的典型。这是由钱谦益自身的“污点”所决定了的。

首先，钱谦益作为明末士林领袖，本应有节气，但却对前明不忠，投降清朝。戴名世所撰《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4] 就是这方面观点的代表。南明首都南京被攻破后，马阮党人吏部尚书张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等自尽，“晚节自全，人皆异之”，而钱谦益“本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天下”，清军一至便投降，且献妃嫔数人于豫王。享有清誉的钱谦益连阉党余孽都不如。钱泳《履园丛话》谓“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唯一死，遂至骂名千载”[5]。可见，社会清议对钱谦益有强大的批评压力。从这一点上说，乾隆帝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十三），第 693 页。

2 按：孟森先生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阐释，清军“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习明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孟森：《清史讲义》，第 183 页。

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一，《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四），第 51 页。

4 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年。

5 钱泳：《履园丛话》二十四《杂记》下《东涧老人墓》，第 637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对钱谦益之批判，只不过是附和了社会清议。

其次，不仅乾隆帝认为钱谦益将反清言论收入集中，其目的是“掩其失节之羞”[1]，早在康熙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2]条就批评：“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分析了谢灵运和王维的文辞欺人行径后，顾炎武笔锋一转，批评“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在炎武看来，有明季贰臣投机不成，才故意发忠愤之论，但炎武并未指明批评对象为谁。朱鹤龄所作《元裕之集后》称元好问金亡不仕，其诗文对元朝无一语指斥，然而，由明入清中有人用对清之“讪辞诋语”，掩盖投降事实，与顾炎武一样，朱鹤龄也只是指出了这个现象，并未坐实为何人。但四库馆臣将朱鹤龄之泛论坐实为批评钱谦益：“其言盖隐指钱谦益辈而发，尤可谓能知大义者矣”[3]。

需要注意的是，乾隆帝编纂《贰臣传》，只是从道德舆论上贬损前明投诚臣子。但对投诚过来的武将，只要不反叛，就不剥夺他们的封爵。如八旗中汉军佐领，是清初招降纳叛的汉人，清朝将他们编入八旗中后，始终未尝歧视。即使过了数代人，也认真处理其上代遗留下来的从属关系等纠纷，使其依靠朝廷而安居，世世代代将其豢养，“此亦清之取信于降人，不使生心。观《封爵表》，贰臣所封之爵，多传至辛亥失国乃至”。[4]总之，乾隆帝虽以批判贰臣的方式劝勉本朝臣子要忠，但基本上还是信守了前朝对贰臣的承诺，保留贰臣的政治、经济待遇，后代皇帝也承袭了这样的做法。

三　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影响与学界再评价的多维化

（一）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影响

乾隆帝毁禁钱谦益之书，将钱谦益列入《贰臣传》，使钱谦益的形象在当时完全负面化，批判、毁禁钱谦益等人的著作甚至杀戮士人的文字狱、禁书运动虽强化了清朝的文化专制，但其对士人造成的噤声效应，则影响了清朝的统治活力。

如上文所述，在乾隆帝严厉批判钱谦益之前，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钱泳《履园丛话》等著作就对钱谦益不能死节而投清的行径给予了严厉批判，但这尚是民间清流意见。乾隆帝批评钱谦益之后，钱谦益不能死节、首鼠两端遂成为官方定论，成为清中后期的主流看法，官修书籍及主流文人均秉持此观点。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总叙》在叙述了集部源流之后，评价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少哉”[5]，从文本内容与世道的角度批评钱谦益，完全承袭了乾隆帝对钱谦益的“定调”。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在评述吕留良文字狱时，将其与钱谦益并列，言吕留良之罪不是辟佛太过，而是其在明亡以后，既不能死节，又不能游离世外，本人在顺治十年（1653 年）应试为诸生。其子葆中有科举功名，再在文章中留下反清复明言论，“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

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高宗纯皇帝实录》影印本（一一），第 155 页。

2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十九，第 1056、1057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第 4 册，第 589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下同。

4 孟森：《清史讲义》，第 112、113 页。

5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总叙》，第 4 册，第 2 页。

殁罹阴谴，自必由斯。”[1] 其思维方法与语气与乾隆帝批评钱谦益如出一辙。

从大的格局来看，对钱谦益的批判，是清朝文字狱、禁书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专制的重要节点。由诸多具体的政策，持续的文字狱、禁书运动（如乾隆帝批判钱谦益）所构成的文化专制，在乾隆朝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嘉庆帝亲政后，不再像雍正帝、乾隆帝那样钳制文人之口。但乾隆朝以批判钱谦益等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高压政策，遏制了士人的反清思想，同时也对士人心理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士大夫主动噤声，与时局保持距离，著书立说，多不涉当时之务，寻章摘句之考据学盛行。而其时，西洋的科技、思想、文化正取得翻天覆地的进展。所以，将文字狱、禁书运动扩大化，对钱谦益等前代已经去世的文人大加挞伐，虽钳制了天下之口，稳固了清朝统治，但却使清朝在思想、文化等领域丧失了活力。

（二）学界对钱谦益再评价的多维化

虽然乾隆帝竭力对钱谦益著作斩草除根，但钱谦益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无法磨灭，他的各种著作顽强地保留下来了。由清朝遗老编纂的《清史稿·文苑一》之《钱谦益传》，客观评价了钱谦益的文学成就，该传叙述了钱谦益在晚明及清前期的文学经历，赞扬钱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不否认其在明末文坛的重要地位。对乾隆毁禁钱谦益著作之事，该传曰：“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2] 承认乾隆帝毁禁钱谦益著作的意图失败，《清史稿》艺文志部分收录了钱谦益书目：

《清史稿·艺文二·目录类》：《绛云楼书目》一卷，钱谦益撰[3]。

《清史稿·艺文三·释家类》：《楞严经蒙钞》十卷，《心经略疏小钞》二卷，《金刚经疏记悬判》一卷，《疏记会钞》一卷，《金刚经论释悬判》一卷，《偈记会钞》一卷，钱谦益撰[4]。

《清史稿·艺文四·别集类》：《杜甫工部集注》二十卷，钱谦益撰[5]。

《清史稿·艺文四·总集类》：《列朝诗集》六集八十一卷，钱谦益编[6]。

最有意思的是《清史稿·艺文四·别集类》在记载了清代诸帝的文集后，又列举了钱谦益书目：“《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钱谦益撰。”[7] 将钱谦益书目与乾隆帝等清帝书目收在一起，真是一件具有历史讽刺效果的事情。

在清朝灭亡之后，学术界对钱谦益进行了全面与深入的研究。虽然有人认为钱谦益降清及勾结阉党为丧失节操之人生污点，致使“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钱氏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可谓咎由自取”[8]。但更有学者提出，“在

1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第 31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2 《清史稿》，第 13324 页，中华书局，1976 年。下同。
3 《清史稿》，第 4313 页。
4 《清史稿》，第 4369 页。
5 《清史稿》，第 4375 页。
6 《清史稿》，第 4408 页。
7 《清史稿》，第 4378 页。
8 培君：《对谦益人品与文品的联系和区别的思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2 期（总第 47 期）。

今天看钱谦益，可以不必再纠缠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气节问题了。现在可以好好地审视一番钱谦益的文学成就”[1]。显然，后一种观点逐渐占据主流，这可以从钱谦益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得到佐证，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台湾彭毅《钱牧斋笺注杜诗补》[2]均为代表，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钱谦益的学术专著不断涌现，涌现出了一大批著作[3]，钱谦益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呈出多维化的趋势。从内容上来看，既有部分学人从忠君角度对钱谦益的评价的，也有众多学人从多角度探求钱谦益降清之心理及动机。前者如反清文人天嘏所著《满清外史》，在《钱谦益之痛斥满洲》一文中列举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的反清诗文后，评论道：

> 虽然，谦益以痛斥满清之词刊入集中，盖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也。既知失节之可羞，当初何不自高其节，乃至首先降清耶？进退无据，君子病之。厥后弘历既毁其版，禁其书，且窜其名于《贰臣传》云。[4]

《满清外史》之立场虽是批判清朝的，但该书对钱谦益之评价，仍与乾隆帝的相关评判如出一辙。即使在新时代，部分论著仍将降清与勾结马士英并称为两大污点，“这两个政治污点前后紧接，集中在易代之际，故钱氏失足在政治节操上。”[5]后者如，近代学者金鹤冲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忍辱以待，他将钱谦益降清比作“范蠡之入宦于吴，李陵之欲得报汉”[6]；现代学者陈寅恪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因为其性格软弱，“太平之世，（钱谦益）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7]；当代学者李庆认为钱谦益等人身上既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意识，又有忠于君主的正统心态，当激烈的社会变动要求他们在生存本能与道德信守之间选择时，对追求享乐、有很强的生命意识的钱谦益来说，选择生也就是自然的事了[8]；当代学人严迪昌认为钱谦益降清的目的是追求功名，钱谦益在明末已是东林党巨魁，希望降清后入阁[9]。此外，还有学人提出了钱谦益降清是为了避免清军屠城、隐忍修史等。

显然，学术界对钱谦益降清原因及心理的多维化论述，打破了乾隆帝对钱谦益的“盖棺定论”，更加符合人性的复杂性，而这正是对钱谦益进行历史定位的关键之处[10]，并使其形象逐步向其本来面貌回归。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陶晓姗）

1 黄绍坚：《“文痞”谦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31f64010086xi.html。

2 彭毅：《钱牧斋笺注杜诗补》，《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4年。

3 参见裴世俊：《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简秀娟：《谦益藏书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孙之梅：《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年。裴世俊：《谦益古文首探》，齐鲁书社，1996年。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谦益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丁功谊：《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 天嘏：《满清外史》，成都昌福公司，1920年。

5 培君：《对谦益人品与文品的联系和区别的思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6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牧斋杂著》，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跋》，第9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861页，三联书店，2001年。

8 李庆：《谦益：明末士大夫心态的典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9 严迪昌：《清诗史》，第3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10 参见丁功谊：《谦益文学思想研究》，第143、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